

來回走,一天下來,全身覆滿灰塵,只露出兩只眼睛。

然而精神上的折磨,遠遠超過身體上的折磨。對於自己的罪名,趙振英始終“不服氣”,他一邊勞改,一邊給法院寫申訴書,經常處于恍惚之中。有天晚上收工回來洗腳,他沒有脫鞋子,就把腳伸進了盆里。



尼爾網站上的老照片

寄出的十幾封申訴書,如泥牛如海,一去無回,等來的,卻是一紙離婚判決書。

趙振英的妻子宋玉岐,是 1946 年他在長春駐守時認識的。她出生於一個大戶人家,還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女大學生。從哈爾濱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系畢業後,她成為吉林鐵路醫院的一名牙科醫生,趙振英去那兒看牙,兩人由此結識、相愛,並於一年後結婚。

夫妻倆的感情一直很好。趙振英心里清楚,妻子一定是不得已才作出這樣的決定。果然,過了幾天,兒子趙精一來探監,偷偷告訴父親:“我媽讓你放心,她不會和別的男人結婚的。”

事後,趙振英獲知,妻子爲了他受了許多苦。在那個時代,“反革命分子”的家屬是抬不起頭的,原本嬌生慣養的妻子,被下放到河南勞動,白天打掃衛生,晚上挨批鬥,批鬥完了還不能回家,只能睡在寫大字報的檯子上,天氣冷了,就用大字報蓋在身上禦寒。

1975 年,這場噩夢總算終結。當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發佈對國民黨縣團級以上軍官的特赦令,趙振英也在這個行列中。特赦後的第二天,趙振英便讓單位開了封介紹信,與妻子復婚。

在這之後的 20 年中,這對歷經磨難的夫妻,終於回歸了平靜的生活。

在趙振英的孫子趙悅眼中,“爺爺奶奶的感情好到不可思議”。從小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趙悅幾乎沒見過老兩口吵過架。記憶中唯一的一次,是奶奶想讓爺爺多吃一塊餡餅,爺爺不願吃,“奶奶氣得好幾個小時沒理他。”

趙振英和妻子在陽臺上養了許多花——君子蘭、月季、海棠……這個從小就在城市里長大的女人,很喜歡看花,在趙振英身體尚好的那些年里,每到春天,他就騎着三輪車,載着妻子,到附近的玉淵潭公園,手挽着手,在櫻花樹下一走就是大半天。

不過,在 2005 年後,趙振英就再也沒去過那個公園。

這年的 12 月 18 日,宋玉岐去世。臨走的前一天,家人還聽到,病床上昏迷的老人家,突然迷迷糊糊地說:“老趙,剩菜剩飯要燙燙啊,每天記得要燒兩壺開水。”

妻子去世後,趙振英沒有將妻子的骨灰埋掉,而是將骨灰盒保存在臥室里,就好像老伴依然陪着他一樣。他的願望,是希望在他自己走後,家人把他和妻子兩人的骨灰混在一起,裝進罐子里,丟進大海。

直到今天,這位老兵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妻子的遺像前,和她說上幾句話。這個習慣,他已經保持了將近 5 年。

“我知道你在苦苦等着我,我也在每天懷念你,我們就快些到一起去吧。”老人哽咽着,眼角泛出隱約的淚花,“我不願意留在這個大地上。怎么說呢?這個大地,對我實在是……太苛刻了……”

他旁邊的鏡框里,是妻子宋玉岐的遺像。這個慈祥的老婦人,一直深情地凝視着丈夫。老人回歸為老兵

如果說,是晏歡幫助趙振英找回了往日的回憶,那么鄧康延做的事,則是把這個老人的故事留在膠片上,讓更多的人知道。

從朋友晏歡那兒聽完整個故事後,深圳市越衆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鄧康延,決定成立一個攝製組,為趙振英拍攝一部紀錄片。

幾年來,這家民營紀錄片公司製作了不少與遠征軍有關的紀錄片,並屢屢在國際國內的紀錄片展會上斬獲各種獎項。在鄧康延眼

中,發生在趙振英身上的這些故事,實在是不可多得的紀錄片題材。

“無論是大歷史還是個人命運,趙老都是過去那個時代的一個樣本。”他這麼解釋自己的拍攝動機,“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二戰老兵,都享受着國家豐厚的養老保障和無限的榮光,惟有在中國,老兵要獨自艱難而頑強地走過生命中最後的日子。如果他們就這樣被湮沒,我們對不起歷史,對不起自己的良知。”

2009 年 5 月,在晏歡的安排下,美國人尼爾如約來到中國,晏歡帶着攝製組,與他一同去了趙振英家。

起初,面對故人之子,趙振英略顯拘謹。這個老兵只是用不太熟練的英語說道:“很高興見到

你。”尼爾卻一下子將老人摟在懷里,哭泣起來。“你讓我想起了我的父親。”這個美國人說。

這次來中國,尼爾·葛頓南給趙振英帶來了一件特殊的禮物——一對父親留下的國民黨軍隊的少校領章。冷靜下來後,他把領章親手戴在了這位老兵的領子上。

這是時隔 60 多年後,趙振英第一次見到代表着往日榮耀的證物。

隨後,晏歡又與鄧康延商量,讓攝製組帶着尼爾和趙振英,一起去一趟雲南和四川。在這趟歷時一個多月的行程中,晏歡欣喜地發現,在與那些舊日戰場重逢之後,老人身上消失已久的軍人英武之氣,“好像慢慢地回來了”。

有一幕場景,深深刻在了晏歡的腦海里。旅程的其中一站,是雲南騰冲的國殤墓園。抗戰勝利後,雲南省政府在騰冲為反攻中陣亡的遠征軍將士修建了這處國家公墓。從來鳳山小團坡的山腳至山頂,依編制密密地排列着 9000 多塊陣亡將士的石頭墓碑,碑上刻着每位烈士的姓名與軍銜,在山頂上,還有一塊大型紀念碑。

通往山頂的台階很長,趙振英每走幾步,就要停下來敬上一個軍禮。晏歡勸老人,休息一會兒再往上走,趙振英卻一直爬到了山頂。他告訴晏歡:“這些弟兄都是戰死的英雄,很多人連名字都沒留下,都在山頂的大碑里。我要是停下來休息,不是讓他們看笑話么?”

那天與攝製組同去祭拜的,還有一個來自香港的警察代表團。在墓碑前三鞠躬後,年輕的警察們合唱起了《滿江紅》,趙振英也加入其中。合唱結束後,人們又向紀念碑集體敬禮致敬。

按照軍銜來算,在場的人里,趙振英的職務最高,於是,這個昔日的少校營長,再一次擁有了“發號施令”的權力。

“向英勇獻身戰勝敵人保衛祖國的英雄致敬!敬禮!”老兵一聲令下,“叭”地一聲,衆人整齊劃一地舉起了右手。

那一刻,晏歡沒控制住自己的眼淚。

一個活的見證者見證歷史

儘管紀錄片拍攝得很順利,但晏歡心里始終有一個放不下的心願。無論是那張老照片,還是那個紅色筆記本,都是約翰·葛頓南少校留下的遺物,作為兒子,尼爾當然想把父親留下的這些遺物帶回美國。但在晏歡看來,這些珍貴的文物應該留在中國。他多次向尼爾承諾,一定會為這些來自異鄉的“寶貝”,找到一個最好的歸宿。

在考慮了幾天後,晏歡決定,將它們捐給位于四川成都大邑縣的建川博物館。這是中國民間資金投入最多、建設規模和展覽面積最大、收藏內容最豐富的抗戰博物館。創辦人樊建川,也被媒體稱為“中國最有歷史情懷的博物館館長”。

在樊建川眼中,由這張老照片和這個小紅本引出的故事,“為觀察那段歷史提供了最為獨特而富有意義的視角”。隨後,在博物館的援華美軍館里,他單獨開闢了一個展廳,向觀

衆展出這些珍貴的文物,在展廳的正中,樹立着他為約翰·葛頓南少校定制的半身雕像。

“請讓我表達對你和你父親的尊敬之情。”在得知約翰·葛頓南的故事之後,一個中國姑娘對尼爾說。

面對眼前發生的這一切,這個此前還半信半疑的美國人,顯得無比激動。

“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朋友。”他感動地回答道。

而在這裏,趙振英也獲得了許久未有的尊重。

在建川博物館的老兵手印廣場上,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將這個老兵的手印放大了 120% %,印在一塊高 3.7 米、寬 2.4 米的鋼化玻璃上。

這個手印並不孤獨。與它相伴的,是其餘 40 多塊鋼化玻璃上的近 4000 只老兵手印。正是這些手,擋住了來勢洶洶的日本軍隊,拯救了整個中華民族。如今,這些老兵的手印,固化成了鋼化玻璃上的印記,也凝固成了一段歷史。

在手印廣場的不遠處,還有一個樊建川設計的“壯士廣場”。在這個 10000 平方米的廣場上,陳列着 215 尊高 2 米的鐵合金雕像。這個鋼鐵鑄成的戰陣里,有打響抗戰第一槍的馬佔山,有盧溝橋抗敵的宋哲元,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也有蔣介石、宋美齡、陳紹寬、張靈甫、孫立人……皆是抗戰時期中華民族抵抗外侮的杰出代表。

晏歡帶着趙振英,來到“壯士廣場”。老人很快就從 200 多尊雕像里發現了自己的老長官——新六軍軍長廖耀湘。老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個躬,然後把一束鮮花放在了雕像面前。

接下來,晏歡問了趙振英一個長久以來一直藏在心里的問題:“如果知道後來會受这么多苦,你還會選擇抗日嗎?”

“我不後悔。”老人回答得很乾脆,“我盡到了一個中國人的責任,還一直活到了今天,我知足了。”目送着老人,看着他步履蹣跚地走進了壯士廣場,晏歡突然間產生了一種幻覺:這個拄着柺杖,背影佝僂的老人,與威武雄壯的鑄鐵戰陣,彷彿融為了一體。

“是英雄而不自知者,才是真英雄。”晏歡感嘆道。

93 歲的老兵重逢 28 歲的少校

四川之行結束後,人們都以為,趙振英的故事到這兒就該結束了。但接下來,又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通過一個在美國的朋友,晏歡弄來了一卷美國人拍攝的南京受降儀式現場的紀錄片。2009 年 4 月的某個下午,攝製組的人聚在一起,想看看里面有沒有什麼資料,能夠補充到即將拍攝完的片子里。

膠片無聲地轉動着,重現着南京受降的種種細節。人們看到,在趙老此前描述過的裹着藍白相間布條的旗杆下,那些全副武裝的士兵的面孔,在鏡頭里依次閃過。

突然間,鏡頭里出現一個年輕英俊的中國軍官的面部特寫,足足有四五秒鐘,他側對着鏡頭,像是在給士兵們訓話。之後,他的正臉轉向了鏡頭。

攝製組的人與趙振英已經相處了很長時間,老人年輕時候的相貌,他們看過相片,也都記在心里。在沉默了一會兒後,人們突然異口同聲地大喊起來:“天啊!這不是趙老嗎?”

“異國影像上保存的這張面孔,正是我們一直苦苦尋找的東西。”事後,鄧康延感慨道,“在宏大的歷史面前,個體是那么渺小無力,但人性中的勇氣與堅韌,將穿越浩淼的時空,永遠被後代銘記。”

2010 年 9 月 7 日,這天晚上,像往常一樣,趙振英煮了一碗餛飩當晚飯。吃過飯後,在昏暗的燈光下,老人躺在床上看了一會兒電視,不到 9 時,他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65 年的 1945 年 9 月 8 日,28 歲的少校營長趙振英終夜未眠,他與團長王啓瑞在團部

開了一夜的會,商量第二天的會場警戒工作。散會後,他不放心,又到禮堂內外巡視了一番。舉目望去,在頭頂晴朗的天幕中,無數的星星在閃耀。

幾個小時後,等到太陽升起,這個少校和他的士兵們,就要精神抖擻地踏入會場,見證他們一生中最值得銘記的榮耀。

本文選自中國青年報

後續:中國戰區受降儀式親歷者

記者在北京拜訪了 98 歲的中國抗戰老兵趙振英。1945 年 9 月 9 日,在中國戰區南京受降儀式上,趙振英作為現場警衛營營長,親眼見證了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全過程。

受降儀式中只有他能自由走動

趙振英是黃埔軍校第 14 期學員,1944 年任中國駐印軍第 14 師 40 團 1 營營長,隨中國遠征軍赴印緬作戰。他所在的國民黨新六軍,被譽為國民黨軍隊“王牌中的王牌”。

1945 年 8 月,蔣介石要求新六軍進駐南京。8 月 28 日,趙振英率領第一營從湖南芷江飛往南京。隨後,他接到任務,負責 9 月 9 日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會場的內外警戒工作。“我當時心里很激動,一方面我有責任保證現場不發生任何問題,另一方面也很感動,這個難得的機會,我能參加為這個儀式做一些工作”。

趙振英記得,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一個軍校的禮堂舉行,從禮堂到外面的馬路,每隔一段距離就有一根旗杆,懸挂中、美、英等國國旗。第一營的士兵,就站在這些旗杆之下,每一個站位都是趙振英提前一天安排好的。“他們都帶着衝鋒槍,但沒上子彈,怕走火”。

趙振英回憶,受降當天,中方受降人員先出來就座,隨後日本代表進入會場。有個細節是當時日本人老老實實低着頭走路,不抬頭,七個人坐在那就把帽子摘了,只有岡村寧次的帽子放在面前桌子上,其餘人拿着帽子坐着。主投降官岡村寧次將投降簽字儀式代表證書讓他的參謀長送到何應欽的面前。何應欽看了以後,把中國擬定的投降儀式書,日文本、中文本各一份,由中國陸軍總參謀長肖毅肅交給岡村寧次。岡村寧次低頭看過投降書的內容後,提筆在投降書上簽字並拿出他的圖章。這時會場的閃光燈很亮,攝影師很緊張地拍攝,擔心錯過了這個瞬間。最後日本代表退場,何應欽發表告全國人民書,說勝利接受日本投降。“整個儀式頂多 15 分鐘,可是很嚴肅很緊張”。

簽字儀式時,趙振英就站在日本代表團投降席的左後方,是會場內唯一能夠自由走動的人。他需時刻注意部下的軍姿和會場的情況,避免出現任何意外。

趙老說,作為作戰部隊,第一營都是統一着裝,“但受降是一個揚國威的事情,所以我還提前定制了一雙馬靴,軍隊本來是沒有馬靴的”。

第二天,南京舉行全市軍民聯歡大遊行。“我還騎着馬走在我們營的最前面”。

60 年後一條新聞讓他首次講述歷史

見證受降儀式讓趙振英感受到了巨大的榮耀,但這份榮耀被老兵深藏在心,連自己的家人都不太瞭解。直到 2005 年 9 月 9 日,趙老看到電視上《新聞聯播》播放南京受降儀式 60 周年的新聞,才開口對兒子兒媳說,“那個時候,我在現場”。

家人通過黃埔軍校網,聯繫到曾任中國遠征軍駐印軍 50 師師長潘裕昆的後人。隨後得知此消息的深圳一家公司為趙振英拍攝了一部《發現少校》的紀錄片,趙振英的故事才被民衆得知。

2010 年,趙振英在朋友的幫助下注冊了微博,常拿着放大鏡看網友的留言,然後由他的孫子將他的口述敲成文字。

趙老的故事引來了大批網友的關注,網友們都親切稱他為“趙爺爺”。趙振英說,看了網友留言,有這麼多人關注民族這段歷史,“感覺過去戰士們的鮮血沒有白流”。

今年 7 月 7 日是全面抗戰爆發 77 周年,趙振英作為老兵代表出席了在中國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的紀念儀式,受到習近平總書記的接見。他將這一幕的照片,當作另一個榮耀紀念挂在家中的牆上。

9 月 3 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趙振英說,作為一名曾經的軍人,他懷念一起保家衛國的中國戰友,“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近百年來抵抗外來侵略的第一次勝利,值得紀念與銘記”。



晏歡(左)與尼爾(右)在交談

“我不後悔。”老人回答得很乾脆,“我盡到了一個中國人的責任,還一直活到了今天,我知足了。”目送着老人,看着他步履蹣跚地走進了壯士廣場,晏歡突然間產生了一種